

民族精神光耀千秋

——论中国抗战文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推动

温朝霞

(广州行政学院, 广州 510070)

摘要: 生发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作为救亡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有着它以前各阶段文学之共同点,即文化倚重上的传统性,但更有特定历史阶段赋予的特质。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战生活,表现爱国军民的民族正气,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中国抗战文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抗战文学; 民族凝聚力; 推动

中图分类号: I 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446(2006)02-0082-04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是20世纪各国人民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一次次地使中国文学发生震撼。一部抗战文学史,就是一面映照抗战风云的镜子。生发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作为救亡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有着它以前各阶段文学之共同点,即文化倚重上的传统性,但更有特定历史阶段赋予的特质。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战生活,表现爱国军民的民族正气,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中国抗战文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作家、艺术家保家卫国的热情与行动,客观上推动了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众所周知,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也点燃了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热情。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

苦难,使他们再也不能远离现实,“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民族的共同立场是民族自救与自立,文艺界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抗战的炮火召唤着广大的文艺家们投身民族解放的战斗。他们有的毅然冲破阻力,从海外归来,如郭沫若、田间;有的为抗战奔忙而又陷于贫病,以致心力憔悴而英年早逝,如王鲁彦等;有的被投入监狱,惨受铁窗之苦,如戴望舒;还有的血洒疆场,如年轻的诗人陈辉等等。许多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艰难的日子里,与祖国、与民族、与人民共同着呼吸,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为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也为中国抗战文学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奉献了丰硕的果实,在诗歌、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创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以田间、艾青、何其芳、柯仲平、臧克家等为代表的诗人,写出了《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义勇军》、《向太阳》、《复活的土地》、《北方》、《他站起来》等诗篇;以郭沫若、夏衍、欧阳予倩、曹禺、老舍、阳翰笙为代表的剧作家群,写出了《屈原》、《虎符》、《法西斯细菌》、《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北京人》、《蜕变》、《归去来兮》、《天国春秋》、《塞上风云》等剧作;

收稿日期: 2005-09-20

作者简介: 温朝霞(1974-),女,广东廉江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广州行政学院《探求》杂志社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文学与文化。

以茅盾、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赵树理、马烽、孔厥、孙犁、刘白羽、姚雪垠为代表的小说家，写出了《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荒地》、《腐蚀》、《火》、《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荷花淀》等名篇。这些作品，或直接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或间接描写抗日大背景下广泛的社会生活。其中的历史题材剧作，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高压政策下的迂回之作，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抗战文学。

纵观抗战文学，诗歌创作最为活跃，诗风明白晓畅，形式多样。报告文学作为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形式，顺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一跃而成为战时文艺的主流。杂文、散文创作日渐繁荣，充分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还有特别令人瞩目的历史剧创作，大都借古讽今，诗情洋溢，是不可多得瑰宝。

抗日战争催生、培育了中国新诗史上阵容最强、最有生气、具有各种各样艺术个性的诗人群。站在这个诗人群最前列的，是伟大的现代革命诗人艾青。他第一首诗《会合》，就是在巴黎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一个集会的记录。当时他还醉心于学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一天，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的法国人走过来，向他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这句话好像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这件事对他投袂奋起、弃画就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和推动。艾青最重要的诗作，如长诗《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诗集《北方》和《旷野》里的抒情短诗，都是当时名传遐迩的抗战诗歌名篇。艾青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由这些燃烧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时代感情，写得开阔深沉、朴素优美、充满新颖的形象和清新的语感的抗战诗歌所奠定的。

一斑可窥全豹。抗日战争在造就一代新诗人方面确实起到了催生婆的作用。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大后方)和沦陷区三种不同的区域里，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抗战诗人群。艾青对抗战时期诗界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个中国新诗空前发展的时期。我国当代的许名著名诗人，大多是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涌现出来的。他们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走上前线。他们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热情与行动，客观上反映了中华民族

凝聚力的形成^[1]。

二、中国抗战文学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讴歌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抗战的到来，使“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力量集中起来，在抗战上形成一个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震撼制约作家们心灵、思维的不再是抒情咏物的闲情逸致和个性解放的大声疾呼，而是支持抗战，自觉为抗战服务的政治理性、赤诚之情、急切吁求。例如，一向写“纯情”散文的丰子恺，听到芦沟桥的炮声以后，写了这样一首和他历来的创作风格大不一样的歌词：“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润之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崩！……”这是一首警醒国人的诗歌，它号召四万万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寇打出去^[2]。“救亡的感情像沸水，/使大家全部变成了疯狂，/这声音，比敌人的炸弹更响，/这声音，像爆烈的火山一样。”(臧克家《伟大的交响》)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人们都在积极参与，时髦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果嗅到一丁点儿被认为含有“异味”的言论，比如梁实秋刚一提出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的观点，就受到严厉谴责。整个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万众一心、共同抵抗日寇的宏伟场面。中国抗战文学正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讴歌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作家们热情歌颂了普通民众“像爆烈的火山一样”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了民众从军观念的变化。过去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是好男要当兵，还要争取当好兵。田汉《征夫别》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景：“(男唱)马萧萧，车辚辚，/辞了情人去出征，/(女唱)车辚辚，马萧萧，/送我们的战士去把国家保……(女唱)送情郎，上战场，/抗强敌，/救危亡，/不凯旋，/不还乡，不还乡！”由悲戚变成了豪壮。还不仅如此。老舍在《兄妹从军》中一扫王昌龄《闺怨》中的悲戚情调：“王家少妇不知愁，夫婿出征雪国羞。更有银娥奇女子，雄心壮志美名留。”由消极的“悔叫夫婿”到自己积极的参与，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主动从军的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曹白《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就作了如此反映。这篇散文写难民所之青年难民要求所方设法让他们到前线去，他

们说：“我们在这里光是吃吃睡睡，无聊，我们愿意上火线，扛子弹，掘壕沟……”使人们深深感到“四百多条生命的强烈的呼吸”。陈瘦竹《庭训》选的是从前仆后继的角度对从军的支持。大儿子大林为国捐躯了，张老爹悲痛欲绝，但他深明大义，又动员小儿子走杀了六个鬼子的哥哥的路。小林也深明事理，穿上了军装，接过了哥哥的枪。鲁彦的《重逢》有些不同。父亲没有张老爹那样的思想，儿子却能像张老爹那样以民族大义为重。他不顾父亲要登报脱离父子关系的威胁，毅然从军去到前线。万迪鹤《复仇的心》也写了志愿参军杀敌的故事。从军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军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前线军队不是为某个统治者卖命，而是为民族而战，为中华民族新生而战。大力支援前线，这是人们的共识。相当多的作家都写过民对军的支持。方敬的《光》写在“严寒的冬夜”妇女们不辞辛劳作奉献，白朗的《老夫妻》写为战争献出了全部储蓄，彭慧的《巧凤家姐》写为修边境公路以利抗战献出了自己^[3]。

作家们详尽地描写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场面，热情讴歌了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新型的军民关系。全面抗战爆发，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抗日军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陈伯尘《慰劳》写的就是历来就怕兵的千金小姐以热情和赤诚之心慰劳受伤战士之事。王西彦《仇恨的生长》描写的军民关系更为感人。一些抗日兵士败退了下來，疲倦得在张二驼子家干马粪里就睡着了。张二驼子返家见了十分内疚，即请进屋，盛情款待。兵士们要去赶大队伍，鬼子兵也将撵来。张二驼子携全家紧跟中国军队撤走，终因无法跟上再加上情况又紧急就失散了。三天后，被日本兵弄得家破人亡的张二驼子只身一人找到部队，不幸的是又被守卫士兵误认为是汉奸打伤了。虽奄奄一息，他仍说“俺不恨老总！……恨那黑心的鬼子！”还祈求地伸出手：“给俺一杆枪……”。鲁彦的《伤兵旅馆》从另外的角度，也就是从张二娘对伤兵由反感、愤恨到和谐以至最后视为亲人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建立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军民鱼水情的过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歌词创作独树一帜的诗人光未然，写下了《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等著名歌词。这些歌词激发了作曲家的灵感，成了伟大乐曲产生的触媒；同时它们也插上乐曲的翅膀飞入

人民大众之中，汇入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中国诗史上传唱最广的爱国主义诗章。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是如此，这首抗战短诗唱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我们国歌不可移易的血肉，将千秋万代传唱下去。

三、中国抗战文学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与骨气，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地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田间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在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4]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状写传奇英雄的人物，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

美德。

一个民族解放的过程,就是正义战胜非正义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体现在人心的转变上。战火唤醒和铸造国人灵魂的新主题,在姚雪垠的《差半东麦秸》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小说的主人公叫作“差半车麦秸”,原是一个愚钝、被人取笑的人物。日本鬼子来了,他抱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观念加入了一支工人游击队。但他老是想妻、儿,即使是在战斗的间隙也要回田间观察,抓起一块土坷拉爱不释手。他不信迷信、讲究忌讳、很自私。但在革命队伍的“集团生活”中逐步觉醒,进步很快,终成为真正的抗日战士。这个人物的觉醒过程,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和革命集体的伟大教育作用,也证明了“救亡”与“启蒙”的内在意义。

骨气,是指硬骨头精神,永不屈服的气概,即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它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性格和民族精神,正如《周易·象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中包括着一种不达目标、永不罢休的精神。对于骨气,抗战文学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一个年轻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到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巧妙地让战士逃走,自己却走向了死神。沈重的报告文学《棋盘陀上五壮士》中,五位战士面对敌人疯狂进攻而自己却弹尽力寡的困境,毫不犹豫地毁掉枪支,跳下了悬崖^[5]。文化底蕴深厚的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对理发匠孙七与民族败类冠晓荷面对活埋现场状貌行止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

骨气除了表现在生与死的考验外,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它通常表现为人们向着既定目标,不惜以生死作为代价的锲而不舍的追求。这种表现比对待生死关头包蕴的内容更为广泛,如果不处在历史大变动期间更容易看得出来。蔡其矫的诗《乡土》塑造的老人就是一个感人的典型。他被日军抓去当苦力,但设法逃了出来,想回家;但疲惫和饥饿使他倒

在通往故乡的路上。他还是两眼遥望着故乡,以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艰难地运动着……。艾芜的小说《纺车复活的时候》中,王荷及其女伴们,不沉溺于少女的青春梦游,而是辛勤地从事着纺线工作,一门心思地欲买一部价廉物美的纺车……。骆宾基的小说《乡亲——康天刚》中,康天刚为实现“有月亮不摘星星”的人生诺言,不惜把青春年华托付给了东北的山陵绝壁。

中华民族的正气、骨气,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审视抗战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它们在文化倚重上是向传统文化回归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所包含的大义凛然、重义轻利、国重于家、坚持操守等内容,确实十分适合各种政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势下,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发挥振国威、扬民气、抖擞民族精神的作用。抗战文学,作为救亡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有着它以前各阶段文学之共同点,即文化倚重上的传统性,但更有特定历史阶段赋予的特质。无论从回归的“广度”还是“深度”上看,它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抗战文学对爱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正气、骨气的表现与弘扬,有力地推动了时人及后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 [1] 曾镇南. 抗战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启示[J]. 求是杂志, 1995, (18): 31.
- [2] 高文波. 抗战文学简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六十周年[J]. 佳木斯师专学报, 1997, (3): 52.
- [3] 文天行. 民族正气贯长虹——中国抗战文学概感[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3): 28.
- [4]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C]. 上海: 开明书店, 1948: 189.
- [5] 高文波. 文化视野中的抗战文学[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4): 61.

【责任编辑: 谢 华】